

· 女性世界与文化叙述 ·

# 当代女性文学中的反性别暴力书写

——以安赫莱斯·卡索的《逆风》为例

夏西遥<sup>1</sup>, 符淑华<sup>2</sup>

(1. 南京工业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江苏 南京 211816; 2. 云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 安赫莱斯·卡索 (Ángeles Caso) 的小说《逆风》(Contra el viento) 以欧洲中产阶级的视角生动展现了非裔移民女性群体在困境中坚韧生存的状态。这些移民面临着来自性别、阶级和种族三个方面的文化暴力和象征暴力, 无数次经历身体暴力、精神暴力和性暴力的折磨。在探索移民边缘群体如何打破暴力链条的同时, 该书作者安赫莱斯·卡索也对当前欧洲中心主义根深蒂固的现象以及多元文化实践所遇到的困境进行了反思。

[关键词] 性别暴力; 结构暴力; 文化暴力; 《逆风》; 安赫莱斯·卡索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838(2024)03-0088-11

随着第三波强调女性群体内部差异、反对本质主义的女权运动的推进, 从 21 世纪初开始, 西班牙文学界逐渐涌现出更多反映第三世界移民女性现状的作品。其中, 安赫莱斯·卡索 (Ángeles Caso) 的小说《逆风》(Contra el Viento)<sup>①</sup> 可被视为先驱之作。作者通过主人公桑 (São) 这一来自非洲岛国佛得角的移民女性代表, 展现了她们在伊比利亚半岛所面临的多重压迫和困境。小说的叙述者是一位来自欧洲中产阶级社会的成员, 她与桑结缘, 并借桑的不幸遭遇省思自身, 最终重燃对生活的热情。小说通过交替运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叙述手法, 使读者获得了更真实的阅读体验。该作品打破了女性移民在父权政治话语中失声的状况, 同时揭示了欧洲多元文化主义进程中的种族矛盾和发展困境。

该小说通过还原和刻画不同处境的非洲女性移民形象, 拓展了以白人女性为主导的女权话语, 并将性别暴力作为叙事内容的表征贯穿全文, 成为情节发展的原始推动力和人物命运困境的根源<sup>②</sup>。这样的叙事引发了如下思考: 在充斥着不公正的环境中, 移民女性所遭受的直接暴力和结构暴力如何影响她们的自我认知和主体建构? 文化和象征暴力如何限制移民女性从多重“他者”身份中解脱出来? 在抗争命运和性别暴力时, 女性人物采取了怎样的策略? 理解这些问题对于把握西班牙当代文学和性别文化发展的方向, 以及探索和解构性别暴力至关重要。

[作者简介] 夏西遥, 女, 南京工业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讲师, 博士, 主要从事西班牙文学、女性文学研究; 符淑华, 女, 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博士, 主要从事西班牙文学研究。

① [西班牙] 安赫莱斯·卡索 (Ángeles Caso) 出生于 1959 年, 她的小说《逆风》(Contra el Viento) 获得 2009 年的“行星奖” (Premio Planeta), 并于次年被人民文学出版社译介出版。

② DÍEZ DE REVENGA F.J., *La Novela Política: Novelistas Españolas Del Siglo XXI y Compromiso Histórico*, Valladolid: Universidad de Valladolid; Servicio de Publicaciones, 2012; TARRE M.B. *Violencia Doméstica y Maltrato Social a La Mujer Inmigrante En La Novela, Contra el viento*, de Ángeles Caso, *Revista Liberia*, Vol.1, 2013, pp.1-26.

在本文中,我们将运用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的“暴力三角”(Violence Triangle)理论和后现代女性主义(Postmodern Feminism)的相关理论,分析该小说中女性人物所经历的性别暴力的表征和根源,揭示直接暴力和结构暴力背后隐藏的文化暴力。约翰·加尔通是被学界公认为当代和平学研究奠基人的挪威社会学家,他在1969年的文章《暴力、和平与和平研究》(Violence, Peace and Peace Research)中首次提出了直接暴力和间接暴力的分类。他指出,直接暴力包括身体暴力和语言暴力等可见的暴力行为;而间接暴力指来自社会层面的制度化暴力,其目的是维持压迫关系,加尔通将这种类型的暴力称为“结构暴力”<sup>①</sup>。一般来说,施暴者和受害者很难第一时间意识到正在发生的暴力行为,因此很难阻止这种暴力行为<sup>②</sup>。作为“结构暴力”的延伸,加尔通在1990年又提出了“文化暴力”的概念,指的是文化中用来合法化直接暴力和结构暴力的方面,例如宗教、语言、艺术等<sup>③</sup>,这是一种更加隐秘而普遍存在的暴力形式。加尔通认为,这三种形式的暴力相互交织、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暴力三角”的三个顶点。当这个“邪恶”的三角以结构暴力和直接暴力作为底部的两个支点时,位于顶部的文化暴力成为合法化这两种暴力的帮凶<sup>④</sup>。

在加尔通的暴力研究中,他也将社会性别视角融入其中,并在专门的章节中阐述了作为直接暴力、结构暴力和文化暴力的父权制度的运作机制<sup>⑤</sup>。他指出,在作为结构暴力的父权制度中,男性处于上层,而女性则被剥夺了平等地位,文化通过教育和规范使得无数的上下级暴力行为被视为自然和正常的现象<sup>⑥</sup>。这个邪恶三角相互支持,不断循环往复:直接暴力行为(如强奸)恐吓和压迫女性,结构暴力将上述暴力行为制度化,而文化暴力则使受害女性内化这种压迫关系而无意抗拒,从而使整个压迫结构更加稳固<sup>⑦</sup>。

可以说,加尔通对父权制社会对女性施加多重压迫的机制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对女性主义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与此同时,他对暴力与社会性别关系的研究也存在一些片面和简化的缺陷。他忽视了文化和社会等更为重要的因素对性别角色塑造的影响,将男性与直接暴力行为的关系简单地归因于生物学因素<sup>⑧</sup>。此外,他将女性等同于感性的、爱好和平的角色,而将男性描述为缺乏同理心、倾向于暴力的角色<sup>⑨</sup>。这种狭隘的性别二元论再次凸显了摆脱父权文化逻辑的困难。然

①GALTUNG J., *Peace by Peaceful Means: Peace and Conflict, Development and Civilization*, Oslo: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1996, p.31.

②GALTUNG J., *Peace by Peaceful Means: Peace and Conflict, Development and Civilization*, Oslo: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1996, pp.75-76.

③GALTUNG J., *Peace by Peaceful Means: Peace and Conflict, Development and Civilization*, Oslo: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1996, p.196.

④GALTUNG J., *Peace by Peaceful Means: Peace and Conflict, Development and Civilization*, Oslo: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1996, p.199; GALTUNG J. *La Violencia: Cultural, Estructural y Directa, Cuadernos de Estrategia*, Vol.183, 2016, p.154.

⑤GALTUNG J., *Peace by Peaceful Means: Peace and Conflict, Development and Civilization*, Oslo: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1996, pp.40-48.

⑥GALTUNG J., *Peace by Peaceful Means: Peace and Conflict, Development and Civilization*, Oslo: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1996, p.33.

⑦GALTUNG J., *Peace by Peaceful Means: Peace and Conflict, Development and Civilization*, Oslo: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1996, p.40.

⑧范若兰:《社会性别视角下的暴力三角学说:解读与重构》,《思想战线》,2014年第1期。

⑨GALTUNG J., *Peace by Peaceful Means: Peace and Conflict, Development and Civilization*, Oslo: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1996, p.40.

而,当代女性文学作品如《逆风》等通过揭露不同社会场域下的性别暴力,以及对女性多重身份的多元解读,为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暴力理论提供了新的阐释。《逆风》以移民欧洲的非洲女性为主角,鲜明地展现了她们在性别暴力中的边缘化影响,从而修正并丰富了以白人女性为中心的欧洲女性主义观点。同时,该作品还对非洲移民女性的主体性进行了深入探讨和重建,为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女性身份认同提供了重要的思考视角。

## 一、《逆风》中的性别暴力

根据联合国妇女署的定义,性别暴力是指“所有基于受害者性别而对其实施的暴力行为”<sup>①</sup>,其中包括身体暴力、性暴力、精神暴力、经济暴力等。性别暴力的根源在于性别不平等和权力滥用,因此,广义上的受害者不仅包括妇女和儿童,还包括部分男性和 LGBTQ 人群等弱势群体。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所探讨的“性别暴力”特指针对妇女的暴力,因为在父权制社会中,女性仍然面临着结构性不平等的两性关系,她们面临的遭受暴力的风险比男性更大,仍然是性别暴力的主要受害者。根据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会议报告,“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反映了历史上男女权力不平等的关系,这种关系导致了男子对妇女的控制和歧视,阻碍了妇女的充分发展。在生命周期各阶段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主要源于文化形态,尤其是某些传统习俗或习惯做法的不良影响以及与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有关的所有极端主义行为,这些影响和行为使妇女在家庭、工作场所、社区和社会中长期处于低下地位”<sup>②</sup>。对性别暴力的研究是探讨男女性别平等发展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领域,对文学作品中性别暴力的深入研究更进一步反映了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对传统性别观念的解构和重塑。例如,通过分析当代文学作品中的性别暴力现象,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社会对性别问题的态度和文化价值观的转变。这种研究有助于促进性别平等意识的提升,推动社会朝着更加包容和公正的方向发展。

《逆风》的主人公桑是一位来自非洲岛国佛得角的移民女性,她在欧洲的经历充满了伤痛和压迫。她不仅遭遇了来自伴侣和陌生男性的暴力,更是性别、种族和阶级歧视驱动下的结构暴力的受害者。这些暴力覆盖身体、精神、性和经济等多个方面。在她流离失所的生活中,当她以为自己终于找到了可以依靠的伴侣时,却发现这个人性格多变、有家暴的恶习。桑首次遭遇家庭暴力发生在怀孕后,她不仅要外出工作,还要拖着肿胀的小腿为休假在家的丈夫比加多尔(Bigador)做饭。当她因为体力不支而拒绝陪伴丈夫下楼喝酒时,引发了比加多尔的极度愤怒,他开始对她实施拳打脚踢的暴力行为:“这突如其来的粗暴行为打碎了她做女人的骄傲和对爱情的向往,打碎了她在生活中逐渐建立起来的盲目信心”<sup>③</sup>。另一次暴力事件发生在迪斯科舞厅跳舞之后,源于丈夫认为妻子忘我跳舞冷落了自己,并且故意勾引其他男性<sup>④</sup>。比加多尔对桑的人身自由限制甚至延续到两人分手之后,当他发现桑有了新交往的男友时,再次向桑砸去了密集的拳头<sup>⑤</sup>。

与身体暴力相关的性暴力是弱势女性常常面临的一种暴力形式。桑和她的同族女性都置身于

①参见 <https://www.unwomen.org/es/what-we-do/ending-violence-against-women/faqs/types-of-violence>。

②UNITED NATIONS, Report of the Fourth World Conference on Women, <https://www.un.org/womenwatch/daw/beijing/pdf/Beijing%20full%20report%20E.pdf>, 2023.07.02.

③[西班牙]安赫莱斯·卡索:《逆风》,刘京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3页。

④[西班牙]安赫莱斯·卡索:《逆风》,第156页。

⑤[西班牙]安赫莱斯·卡索:《逆风》,第189页。

性暴力横行的环境中。首先,桑的出生本身就是性暴力的结果——她的母亲卡利娜(Carlina)在一次酒后被酒吧老板性侵,导致怀孕<sup>①</sup>。尽管书中没有明确说明为什么卡利娜在事发后没有考虑报警,但可以想象,在一个封闭落后的非洲小村庄,一个女人被强奸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而且即使报警,在一个针对性暴力的法律并不健全的地区,施暴者也很难得到法律的惩罚。当桑在当地一户富裕人家当女佣时,她遭遇了男主人的性骚扰,差点被强奸。尽管她在事发之前就一直感受到危险的存在,正如作者所描述的:“每次主人在她身边转悠时那样,她觉得很不自在,仿佛她能听到内心有个声音在通知她,说她遇到了危险”<sup>②</sup>。然而,当危险突然袭来时,她仍然感到茫然和不知所措。最后,她通过身体的恶心反应和承担失去工作的代价保护了自己。而桑的朋友本温达则是从小就不得不忍受父亲酒馆里的客人对她的性骚扰:“只要她父亲有什么事几分钟不在,就会有顾客晃悠悠地打着隔想在她身上乱摸,想吻她的嘴,甚至让她抓住自己的生殖器,以使他们舒服舒服……她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被饿死和努力做到不被任何男人强奸”<sup>③</sup>。以上内容展现了在性别不平等和权力滥用的背景下,桑和她的同族女性所遭受的性暴力,凸显了性暴力对女性的身体、心理及其社会关系造成的影响。

除了直接对身体造成伤害的暴力行为外,女性还经常承受着无处不在的精神暴力。精神暴力通常通过言语暴力和潜在的恐惧威胁来实施。桑和她的同族女孩们从小生活在长辈的责骂和陌生男性的性骚扰的环境中。一些女孩由于长期遭受继父的性骚扰,以及笼罩在被强奸的阴影和恐惧中,不得不离开家乡。即使在欧洲,对于这些非洲女性移民来说,高度的精神压力依然存在。桑在葡萄牙的一家餐馆打黑工时,第一次感受到种族差异引发的歧视,她从周围人的眼神中感受到了这种压力。尽管她试图通过假装无视来避免冲突和伤害,但仍多次遭到欧洲当地男性的嘲讽和羞辱,最终因冲突而失去了工作<sup>④</sup>。

桑处于种族和性别上的双重弱势地位,使她不仅在工作中遭受精神暴力,而且她的婚姻生活也充满了威胁和恐吓。在遭受比加多尔的家庭暴力后,桑失去了自尊和自信,同时也失去了对抗的能力。她只能感受到恐惧,为了孩子的成长而忍辱负重。直到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逃离丈夫,乘车去马德里时,她的恐惧才逐渐消散,也在这时她才意识到自己长时间蜷曲的身体已经驼背:“突然她觉得自己的身体开始伸展开来,座位几乎都容不下她了,这时她才意识到,这么长时间里,她一直蜷缩着身体,已经驼了背自己竟无察觉。几个月以来,她唯一能够看到的就是地面以及地面上所有令人作呕的污物”<sup>⑤</sup>。

这些贫困地区的女性终其一生都无法摆脱各种形式的暴力。“她们的父母有的是酒鬼,有的是乞丐,有的是妓女——就是些不该生存于世的寄生虫、蟑螂,而她们本人则在血液里带着那种肮脏痕迹和腐烂味道,她们注定要不遗余力地同与生俱来的恶魔进行斗争,而那个恶魔一次又一次地把她们打翻在地,用她们难以承受的重量压垮她们。”<sup>⑥</sup>这个恶魔就是由贫困、种族和性别赋予的标签所构成,自她们出生起便深深地烙印在她们的生命中。由于在这三个方面都长期处于弱势的地位,她们陷入了无休止的结构性暴力之中,成为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种族歧视和不公平婚姻制度的受

①[西班牙]安赫莱斯·卡索:《逆风》,第40页。

②[西班牙]安赫莱斯·卡索:《逆风》,第88页。

③[西班牙]安赫莱斯·卡索:《逆风》,第94页。

④[西班牙]安赫莱斯·卡索:《逆风》,第111页。

⑤[西班牙]安赫莱斯·卡索:《逆风》,第161页。

⑥[西班牙]安赫莱斯·卡索:《逆风》,第52页。



害者。因此,桑和她的非洲女性同胞们,一代又一代、一次又一次地经历着贫困带来的死亡威胁、种族歧视带来的就业和经济困境,以及婚姻中性别不平等带来的暴力和恐惧。所有这些恶行都是“父权社会中制度化的结构暴力的具体和特定的表现”<sup>①</sup>。处于男权社会和欧洲中心主义根深蒂固的移民环境中,非洲女性移民始终处于结构性暴力最弱势的地位。

## 二、性别暴力的温床——多重文化暴力

根据墨西哥人类学家马塞拉·拉加德(Marcela Lagarde)的观点,针对女性的性别暴力纯粹基于她们作为女性的身份而发生,并存在于不平等权力结构之中。这种暴力通过身体、性别、经济、言语和象征方面的手段来压制和控制女性。它是一种文化而非自然产生的,源于父权社会普遍存在的厌女情结<sup>②</sup>。文化暴力作为直接暴力和结构暴力的背后推动力,为这些暴力行为提供了合理性和解释,从而使施暴者能够自圆其说,同时使受害者陷入其中难以自拔。男女性别不平等的权力结构是父权社会秩序的基石之一。正是由于性别不平等,才能通过将女性客体化和异化来维持男性的主体地位,加强男性之间的同性社会性欲望,从而合理化暴力行为<sup>③</sup>。

在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于1998年出版的著作《男性统治》中,他详细阐述了社会秩序的构成性分裂。这种分裂是由于社会对身体的性别化构建所导致的。将身体视为性别的实体,并赋予其性别化的价值和属性原则。这种二元构建也同样适用于其他权力关系,如种族、阶级或族裔关系。这种构成性分裂逐渐形成了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这两种不同的特质。在身体和外层面上,它表现为不同的身体表达方式和行为方式。但事实上,这种分类被认为是自然而然的社会本质,因此它反过来影响着男女的行为习惯和感知模式。正是通过这种二元对立的编码分类和社会性别的联系,象征暴力——即文化暴力——得以产生。布尔迪厄指出:“象征支配(无论是种族、性别、文化、语言等)的效应并非仅限于纯粹的意识知觉逻辑,而是通过感知、评估和行动的模式来实现的。这些模式构成了习惯,它们在意识和意愿控制之前,为人们创造了一种对自身而言极为隐晦的认知关系。”<sup>④</sup>因此,象征力量是一种直接作用于身体的权力形式,几乎像是魔法一般超越了一切身体上的物理强迫力<sup>⑤</sup>。它以温和、隐蔽和潜移默化的方式施加于人们的内心深处,是一种无形的暴力。

这种存在于意识之前的象征层面的暴力大量反映在男女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和社会对此关系的自然化中。社会对男女不同的要求和期待时刻都在给女性设置各种困难和障碍,这种文化暴力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社会中显得尤为明显。男孩和女孩从出生起就受到不同的待遇,男孩被视为父母的希望,而女儿则被视为洗衣做饭的工具<sup>⑥</sup>;女性因为不能怀孕而否定了自身身体的意义<sup>⑦</sup>;卡利

①SAU V., “De La Violencia Estructural a Los Micromachismos”, in *El Sexo De La Violencia. Género y Cultura De La Violencia*, V. FISAS (ed), Barcelona: Icaria Editorial, 1998, pp.165-173.

②LAGARDE M., *El Derecho Humano de Las Mujeres a Una Vida Libre de Violencia*, Universidad de Chile, Programa Mujeres y Derechos Humanos, [http://catedraunescodh.unam.mx/catedra/CONACYT/16\\_DiplomadoMujeres/lecturas/modulo2/2\\_MarcelaLagarde\\_El\\_derecho\\_humano\\_de\\_las\\_mujeres\\_a\\_una\\_vida\\_libre\\_de\\_violencia.pdf](http://catedraunescodh.unam.mx/catedra/CONACYT/16_DiplomadoMujeres/lecturas/modulo2/2_MarcelaLagarde_El_derecho_humano_de_las_mujeres_a_una_vida_libre_de_violencia.pdf), 2023.07.02.

③[日]上野千鹤子:《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玉兰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0页。

④BOURDIEU, P. *La Domination Masculine*,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98, pp.53-54.

⑤BOURDIEU, P. *La Domination Masculine*,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98, p.54.

⑥[西班牙]安赫莱斯·卡索:《逆风》,第30页。

⑦[西班牙]安赫莱斯·卡索:《逆风》,第32页。

娜去酒馆喝酒时遭到男人们的鄙视和凝视<sup>①</sup>。女性总是与生育和性客体紧密联系在一起,而男性则被赋予智慧和性主体的角色。由于男性将女性视为婚姻中的财产,他们不允许女性与其他女性或男性建立联系,以实现女性的隔离,达到男性对女性的统治。比加多尔不喜欢桑和莉莉亚娜之间过于亲密的关系,并经常批评桑的朋友:“她要干什么?她那张女权主义者的脸让我紧张。她把我看得很坏,好像我是个怪物似的”<sup>②</sup>。当桑第一次遭遇家暴后,她本想逃离丈夫,但由于社会对单亲母亲缺乏关怀和支持,甚至对其恶意攻击,桑选择了忍耐。正是由于男女不平等带来的象征暴力,桑被迫自愿承受丈夫的暴力。当桑带着孩子逃离重新开始生活后,前夫依然以单身母亲无法健康抚养孩子为借口,催促桑重新回到他身边<sup>③</sup>。前夫以孩子为理由要挟桑,这反映了传统社会性别对男女所赋予的不同特质和期待。传统观念认为,单亲母亲会面临社会歧视,并难以胜任抚养孩子的责任。

除此之外,对受害者的污名化更是父权社会对女性赤裸的文化暴力。当桑坚决拒绝男主人的性侵时,后者反过来斥责她引诱在先:“得了吧,清教徒……难道不是你几年来穿着那种凸显全身的衣服如裸体一般在我面前晃荡吗?……现在你又不干了?你想怎么着?……你要的不就是这个吗?”<sup>④</sup>苏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在她的专著《违背我们的意愿》中指出,男性普遍相信“女性渴望被强奸”,这一信念源于对男性特权的过度自信,以及男性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彰显他们的男性气质。同时,这也是强奸犯最常使用的托词,以此将罪责推脱到女人身上<sup>⑤</sup>。加尔通也指出,统治阶级的结构暴力的首要表现是对受害者进行污名化,将责任归咎于她们引发了暴力事件<sup>⑥</sup>,这种现象在背负种族和性别双重边缘身份的移民女性中更为普遍。宗教同样为父权社会秩序中的性别暴力背书。卡利娜在发现自己怀孕之后,身为天主教徒的她知道自己除了生下这个孩子别无选择:“神父常说,堕胎的妇女无可救药地要下地狱”<sup>⑦</sup>。因此,虽然明知生育会让她困苦的生活雪上加霜,她仍然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卡利娜走出的每一步都让人痛心,看似注定的命运背后是整个父权社会和父权文化沆瀣一气给她扣上的环环枷锁,最终把她逼入了绝境。

比加多尔这样的施暴者在两性关系中对伴侣实施暴力的行为与男性主导权的确立密切相关。暴力被视为一种有效的手段,用于掌控局面并强制施加男性意志,其目的是削弱女性的意志力和逃脱的念头<sup>⑧</sup>。父权文化对女性价值的贬低以及宗教的污名化促使男权社会将性别暴力视为一种合理的惩罚方式<sup>⑨</sup>,以此来维护男性的权威地位。这种男权社会中流行的大男子主义表明了传统二元对立的性别关系中男性主体性的异化,其建构依赖于和另一性别的从属关系,这种依赖关系也决定了男性主体性的不稳定性。例如,当桑对比加多尔的要求表示拒绝时,暴力成为他唯一能想到的手

①[西班牙]安赫莱斯·卡索:《逆风》,第39页。

②[西班牙]安赫莱斯·卡索:《逆风》,第144页。

③[西班牙]安赫莱斯·卡索:《逆风》,第183页。

④[西班牙]安赫莱斯·卡索:《逆风》,第89页。

⑤[美]苏珊·布朗米勒:《违背我们的意愿》,祝吉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9页。

⑥GALTUNG J., La Violencia: Cultural, Estructural y Directa, *Cuadernos de Estrategia*, Vol.183, 2016, p.156.

⑦[西班牙]安赫莱斯·卡索:《逆风》,第41页。

⑧ALBERDI I, MATAS N., La Violencia Doméstica: Informe Sobre Los Malos Tratos a Mujeres en España. [https://fundacionlacaixa.org/documents/10280/240906/es10\\_esp.pdf/48d3de8c-f44e-45d2-946f-256cec7ee7bc](https://fundacionlacaixa.org/documents/10280/240906/es10_esp.pdf/48d3de8c-f44e-45d2-946f-256cec7ee7bc), 2023.07.02.

⑨ÁLVAREZ A.D.M., La Construcción de un Marco Feminista de Interpretación: La Violencia de Género, *Cuadernos de Trabajo Social*, Vol.18, 2005, pp.231-248.

段,以维护自己的男子气概和尊严。在夺走儿子后,为了阻止桑夺回孩子,他将死亡威胁作为最有效的手段。尽管暴力经常被用于解决冲突,但由于其缺乏公平正义,因此很难得到受害者的认同<sup>①</sup>。事实上,“暴力可以摧毁权力,但绝对无法创造权力”<sup>②</sup>。因此,桑在长期忍受丈夫的暴力后最终选择逃离,并在收到他的死亡威胁后,仍然决定独自前往夺回孩子。这表明比加多尔的暴力行为摧毁了他在桑心中的权威形象,揭示了他的懦弱和无能,并激发了受害者的反抗。受害者的反抗行为增加了弱势一方的主观能动性,并拆解了看似男强女弱的两性关系,否定了两性二元对立的论断,赋予了弱势一方力量,展现了权力在任何看似稳固的结构中都是不断变动的,既能被消减也能被强化。同时,这也凸显了弱势一方自我赋权的机制。他个人的暴戾性格在另一方面也是社会文化暴力的结果。皮埃尔·布尔迪厄认为男子气概与象征暴力有着密切联系。男性统治气质并非自然而然的,而是社会化的结果:“男子气概被理解为繁殖能力、性能力和社会能力,同时也和战斗和施暴联系在一起,它其实是一种外加的负担”<sup>③</sup>。比加多尔从小就生活在充满战乱和贫穷的社会环境中,通过偷抢他人的东西维持生计,这种极端的社会环境塑造了他的性格,使他认为暴力是有效的生存手段。在模仿暴力行为的过程中,他逐渐形成了具有暴力倾向的性格特征。

在现代社会,武力和暴力是普遍存在的,女性由于生理和情感上的劣势,几乎无法自卫,面对男性暴力感到无助<sup>④</sup>。除了体力上的差距,弱势群体对于不平等的性别权力结构的同化和承认,也导致她们对所经历的暴力行为变得正常化和合理化。无论是霍维塔还是卡利娜,她们并非对暴力无动于衷,而是在潜移默化中无奈地接受了她们作为从属者的地位。霍维塔就已经完全接受了生活的现实:“生活就是苦难和伤痛的结合,那是挨饿的痛苦,整天饥肠辘辘,极度的虚弱扩散到全身,并在头脑里不停地跳动;那是十一次分娩的痛苦——其中四个孩子死了,七个去了欧洲,一直也不来看她;再就是喝醉了酒的男人们抽打她的痛苦……”<sup>⑤</sup>这正是文化暴力发挥作用的机制,整个环境和文化使受害者将暴力视为正常现象,并且削弱了她们对暴力行为带来负面后果的感受<sup>⑥</sup>。

移民女性的多重边缘身份使她们面临更加困难的处境,并加剧了她们所遭受的多重暴力。根据针对西班牙本国女性和移民女性的性骚扰调查数据,移民女性在各个社会场合遭受的性骚扰频率和恶劣程度明显高于当地女性<sup>⑦</sup>。在欧洲,她们主要从事家政和性工作等行业<sup>⑧</sup>,这些行业通常被视为边缘化和受歧视的领域。这种职业选择限制了她们社会地位和经济独立性,使她们更容易成为性暴力的受害者。可以想象,移民身份所带来的经济、法律资源的匮乏以及情感支持的缺乏使得她们处于更加弱势的位置<sup>⑨</sup>。正因如此,桑在葡萄牙打工期间,只能选择忽视和容忍客人的种

①BENJAMIN W., *Para Una Crítica de La Violencia*. Buenos Aires: Leviatán, 1995.

②ARENDT H., *Sobre la Violencia*. Madrid: Alianza, 2006.

③BOURDIEU P., *La Domination Masculine*, París: Éditions du Seuil, 1998, p.68.

④MILLETT K., *Sexual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

⑤[西班牙]安赫莱斯·卡索:《逆风》,第25页。

⑥GALTUNG J., *La Violencia: Cultural, Estructural y Directa*, *Cuadernos de Estrategia*, Vol.183, 2016, p.196.

⑦CUENCA-PIQUERAS, C., *Incidencia en Los Tipos de Acoso Sexual en el Trabajo en España*, *Convergencia*, Vol.21, 2014, p.139.

⑧NAVAZ, L.S., *Transformaciones de Género en el Campo Transnacional. El Caso de Mujeres Inmigrantes en España*, *La Ventana, Revista de Estudios de Género*, Vol.20, 2004, p.324.

⑨MENJÍVAR C., SALCIDO O., *Immigrant Women and Domestic Violence: Common Experience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Gender and Society*, Vol.16, 2002, pp.898-920.



族歧视,以保住工作,并减轻精神暴力带来的伤害。

文化暴力在性别暴力中充当了其辩护的角色<sup>①</sup>。当女性内化性别暴力的合理性时,实施性别暴力变得越来越容易,而逃离性别暴力则变得更加困难。卡利娜经历了强奸却没有报警,是因为她不想成为污言秽语的目标。因为“人们普遍相信是女人自己引诱男人来强奸她们,而且是她们自己不慎的行为导致了被强奸”,“女人的不安全感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很多,甚至大多数受害人在事后对自己导致强奸的行为举止和着装追悔莫及”<sup>②</sup>。这种顺从正中统治阶级的下怀:维护现有秩序,最终确保统治的延续。当莉莉亚娜鼓励桑去揭露比加多尔对她的家暴时,桑打消了这个想法:“不,不!如果我告他,他会杀了我,也许还会伤害孩子。他不想有人告他。我认为他不在乎告他。我不能告他!我需要离开这里,离开葡萄牙,去一个他永远找不到我的地方”<sup>③</sup>。

女性对现实情境,尤其是她们所处的权力关系的解释,常常是基于对这些权力关系的同化和认同,并可通过符号秩序的基本对立进行解释。因此,可以推断出她们的认知行为是一种实践性的认知行为,一种对现实事实的承认和契合,无须经过深思熟虑或明确确认的信念。这种信念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她们所遭受的象征暴力<sup>④</sup>。因此,弱势女性主体的建构同样依赖权力的存在。这种依赖关系在她们的个人层面上根深蒂固<sup>⑤</sup>。当桑首次遭遇家庭暴力并考虑逃离丈夫时,她想到自己“会重新成为一个没有男人的女人,一个在寒冷的夜晚没有另外一个身体与之相拥的女人。天啊,她会怎样怀念那个身体!她会怎样回忆那种欲望和快活,以及那无休止的抚摸!……谁来照顾他呢?谁能让他保持衣着整洁,卫生间干干净净,回家就吃现成饭呢?”<sup>⑥</sup>女性对爱情的追求和依恋,往往表现为对爱情客体的理想化,与现实存在差距<sup>⑦</sup>,这种对亲密关系的依恋和对不平等关系的故意忽视和正常化,无疑是文化暴力的一种表现,为性别暴力的滋生提供了温床。这种现象将处于性别暴力机制中最弱势的女性群体困在了一个难以摆脱的困境中。

### 三、对抗性别暴力的策略——打破暴力三角

当直接暴力、结构暴力和文化暴力环环相扣,形成一条看不见的压迫链时,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体只能通过自我意识的觉醒、拒绝性别暴力以及打破暴力所根植的文化逻辑来逃离这种三重暴力的束缚。在桑的例子中,尽管她小心翼翼地努力,仍多次遭受丈夫的暴力。然而,在一次毫无理由地被殴打后,“桑全身疼痛,满脸的伤痕也被婆婆涂上了碘酒,这时她才终于努力贴近现实,驱走了恐惧,找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自尊,于是她如此的屈辱即将结束,还有带动她的力量,把她从沦落的角落里解救出来,让她重见阳光”<sup>⑧</sup>。桑开始寻回自尊和主见,她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在家庭关系中的真实状况,打破了对婚姻美好但不现实的期望,并决定离开比加多尔,独自带走儿子安德烈。当

①SORIA V, ÁNGEL, M, HERNÁNDEZ SÁNCHEZ J. A., *El Agresor Sexual y La Víctima*, Barcelona: Editorial Boixareu Universitaria, 1994, p.28.

②[西班牙]安赫莱斯·卡索:《逆风》,第340页。

③[西班牙]安赫莱斯·卡索:《逆风》,第159页。

④BOURDIEU, P., *La Domination Masculine*,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98, p.49.

⑤CAMPILLO N., L' ambivalència del Sotmetiment. Violència i Gènere, *L' Espill*, Vol.19, 2005, pp.69-77.

⑥[西班牙]安赫莱斯·卡索:《逆风》,第137-138页。

⑦POTOK, M., *EL MALESTAR, La Narrativa de Mujeres en la España Contemporánea*, Poznan: Wydawnictwo Naukowe UAM, 2010, p.242.

⑧[西班牙]安赫莱斯·卡索:《逆风》,第156-157页。



桑开始反抗比加多尔的暴力时,他感到自己的权威受到了威胁,恐惧驱使他继续使用暴力来巩固自己的权力。他勃然大怒,通过短信和电话对桑进行各种辱骂,甚至威胁她的生命。暴力是施暴者们最后的手段,是深受父权社会影响的结果。他们将男子气概视为男性主体的根本,并将暴力视为维护男性权威和男性主体性的唯一方式和途径,这一观念在父权社会中得到了根深蒂固的灌输。

桑在认知自身处境和采取反抗措施的过程中,女性情谊的支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她还在非洲乡下的时候,纳特西亚和本温达这些独立自由的女性形象为她树立了与传统女性角色不同的榜样,让她看到了除了洗衣、挨打和生育以外的命运的可能性。在遭受丈夫身体暴力和精神暴力时,同样是受害者的婆婆用黑色幽默陪伴她走出恐惧的阴影。同为移民女性,莉莉亚娜在桑的命运转折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她不仅帮助桑在当地找工作,还在桑交男朋友时嘱咐她谨慎,并在桑遭遇家暴后没有责备她的懦弱,反而积极地帮助她思考对策。莉莉亚娜成为桑在欧洲移民困难生活中最可靠的后盾,给予她最可依赖的情感支持。

桑和周围女性之间的相互支持和保护彰显了姐妹情谊在反抗性别暴力中的有效性和可行性。姐妹情谊是当代女性主义在伦理、政治和实践层面上提出的一个主张,鼓励女性寻求积极的关系,建立身体对身体、主体对主体的共生和政治联盟,以共同行动消除各种形式的压迫,相互支持并实现女性的性别权力和个体的自我赋权<sup>①</sup>。然而,在对抗根深蒂固的性别暴力的过程中,姐妹情谊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由于姐妹情谊与父权社会对女性友谊的反对准则相抵触,婚姻被认为是女性唯一可以参与的联盟。因此,在现阶段,姐妹情谊仍然是一个边缘的概念。相较根深蒂固的主流父权文化,它在意识和实践上仍然无法超越前者。举例来说,当莉莉亚娜提醒桑不要被爱情欺骗时,桑由于对浪漫爱情的向往而没有给予足够重视;而纳特西亚在得知好友因为害怕继父的性骚扰而不得不离家出走时,主动提出帮助她的想法。尽管好友感受到一丝希望,但由于未知的风险和缺乏实践模板,这一希望瞬间破灭<sup>②</sup>。因此,姐妹情谊在父权文化的氛围中通常只能以同情心存在于女性之间的关系中。它的发展和实践仍然面临着挑战,需要逐渐超越父权文化的束缚,以真正彰显其在反抗性别暴力方面的力量。

性别暴力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不平等的性别权力关系和社会性别存在。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她于1990年出版的著作《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颠覆》(*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中提出了社会性别是一种表演性的概念,而不是固有的本质。黛博拉·P·布里茨曼(Deborah P. Britzman)也指出,阐释层面的实践活动也具有社会表演的性质,因此进行批判性的阅读和解释是必要的。我们可以将现实视为一种建构,因此需要考虑身份的不断变化,并将其置于被视为真实的领域和(不)可辨认之后的突破性空间中,尽管这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和有限范围内进行<sup>③</sup>。这样的批判性阅读可以开启新的语境,产生新的、未被认可的形式,从而为对身份的理解提供新的可能性。

卡索在《逆风》中对女性尤其是非洲女性移民的社会性别角色进行了多维度的阐释,涉及了女性的性欲、母女关系、两性关系、审美观念等方面。霍维塔是一个生育了十几个孩子的母亲,她的形象与传统的慈母形象截然不同,充满了野性和欲望的特点:“她曾多次酗酒,喝下很多甘蔗酒,烈酒

① LAGARDE M., Pacto Entre Mujeres: Sororidad. *Aportes Para el Debate*, Vol. 25, 2006, pp. 123-135.

② [西班牙] 安赫莱斯·卡索:《逆风》,第56页。

③ BRITZMAN D. P., “La Pedagogía Transgresora y Sus Extrañas Técnicas”, in *Sexualidades Transgresoras: Una Antología de Estudios queer*, RAFAEL MÉRIDA JIMÉNEZ (ed), Barcelona: Icaria editorial, 2002, p. 222.

让她浑身发热,变得粗野蛮横,迫使她着了魔般地跳舞,或者打孩子,或者在地上爬,或者无缘无故地摔东西。然后就是性,那是她特别喜欢的”<sup>①</sup>。小说中的母女关系充满了经济负担,缺乏情感上的联系。卡里娜在桑出生后就对她充满厌恶,将女儿视为负担。桑在没有母爱关怀的环境中长大,没有对母亲的情感依恋。她和母亲之间只存在经济关系:母亲寄钱供她上完小学,之后她打工寄钱给母亲来补贴家用,仅此而已。

小说中女性对待爱情和婚姻的态度也是多样的。纳特西亚对这两者都没有兴趣,她心中只有教育事业。而卡利娜则再婚多次,她的婚姻生活除了暴力和赤裸的性欲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亮点。在处理世俗意义上的第三者问题时,作者展现了与男性视角不同的女性关怀。桑和前夫的新伴侣之间没有恶意或猜疑,相反,后者的善意为桑争取回儿子的抚养权提供了途径。小说中展示的社会性别在实际社会构建中呈现出多样性,与父权文化中简单的二元对立形成鲜明对比,进而否定了父权文化中固守的性别二元象征暴力。这样的描述和展现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性别角色的多样性,同时促进了传统文化中关于两性关系和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的消解。

朱迪斯·巴特勒在对语言中的象征暴力进行阐释时指出,语言的使用涉及社会和文化的斗争,通过重新诠释具有冒犯意味的言辞,我们可以削弱象征暴力的基础。诠释语言需要开辟新的语境,以一种尚未被合法认可的方式来表达,从而产生新的、未来的合法形式<sup>②</sup>。当桑遭受当地男性的种族歧视和羞辱时,莉莉亚娜向桑解释了为什么白人称她为“黑鬼”：“你知道所有那些种族主义分子为什么要这样做吗？他们嫉妒我们。你没注意到你有多可爱吗？你以为那个家伙会遇见过像你这么漂亮的女人吗？你看看这皮肤,多么光亮和柔润,这颜色多么赏心悦目,配什么衣服都好看。你没看到他们夏天待在这儿想把自己晒黑还办不到吗？还有你的臀部”<sup>③</sup>。她对欧洲中心主义文化暴力进行了解构,为受害者赋予了尊严和合理的价值感,从而实现了对语言暴力的缓解。与此同时,她还通过瓦解“受害者”身份,为其赋予了抗争者的身份认同,鼓励其建立更积极有意义的主体性,从而摆脱或减轻了文化暴力试图削弱弱势群体主体性的企图。

莉莉亚娜作为一个积极关注政治的非洲女性移民,对欧洲未来政治形态的发展表达了大胆的看法：“她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葡萄牙也会有很多来自非洲的政治家,他们都是老殖民地的后裔,她认为这是个不可避免的政治进程。就像在法国,大革命把资产阶级送上了权力宝座一样,非洲人通过他们的先期努力和智慧,几个世纪里已经为宗主国的繁荣富强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最终也将坐到统治者的位子上”<sup>④</sup>。作为欧洲主流社会的一员,作者对移民参与本土政治的支持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对当前移民生存环境的关切,通过文本在话语层面上赋予非洲女性移民权力,支持从底层推动改善移民环境的努力<sup>⑤</sup>。这种支持不仅为移民群体赋予了更多的话语权,而且反映了欧洲日益增多的移民群体在文化、工作、社会、政治等方面对欧洲中心主义文化的影响和渗透。这种文化交流和权力的流动,既是弱势文化弥补强势文化的过程,也是文化多样性和社会包容性的体现。

①[西班牙]安赫莱斯·卡索:《逆风》,第27页。

②BUTLER J., *Lenguaje, poder e identidad*, Madrid: Síntesis, 2004, pp.71-73.

③[西班牙]安赫莱斯·卡索:《逆风》,第113页。

④[西班牙]安赫莱斯·卡索:《逆风》,第109页。

⑤经过2012年《移民法》(*Ley de Extranjería*)的修订,西班牙没有合法身份的女性移民在面对性别暴力时终于看到了生存状况的巨大改善。进一步地,2017年修订的《反性别暴力政府协定》(*Pacto de Estado Contra la Violencia de Género*)在各个部门的共同推动下,推进了西班牙消除对女性的暴力、保障女性基本权力和自由的进程,为此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 四、结语

安赫莱斯·卡索的小说《逆风》以非洲女性移民群体艰难的生存状态为切入点,展示了移民的坚韧品质。同时,该小说也间接探讨和反思了当前以移民问题为焦点、多元文化政策陷入困境的欧洲社会。

女主人公所经历的性别暴力是她命运多舛的重要原因之一。性别暴力以其稳固的“暴力三角”——直接暴力、结构暴力和文化暴力——充斥并威胁着非洲女性移民的生存。身体暴力、精神暴力和性暴力构成了她们生存环境的阴影,而男女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秩序中存在的象征暴力又为性别暴力提供了合理化的解释和支持,使女性在婚姻家庭所代表的私人空间和工作所代表的公共领域中时刻处于文化暴力庇护下的性别暴力之中。受害的女性由于其作为弱势主体的构建依赖于不平等的性别权力关系,只能以象征暴力的逻辑来解释自己作为受害者的遭遇,因而难以摆脱象征暴力与性别暴力的循环。

在探寻打破“暴力三角”可能性的过程中,作者一方面将姐妹情谊作为激发女性自我意识觉醒、帮助其逃离性别暴力的有力支持,另一方面着重于象征暴力的表演性阐释。通过对社会性别的多元构建和对种族歧视言语的重新诠释,作者在象征暴力的压抑空间中找到了一条突破口,通过不断重复和延续这种多元诠释,以达到消解性别暴力和欧洲中心主义的目的。

### Writing against Gender-based Violence in Contemporary Women's Literature:

#### A Case Study of ángeles Caso's *Contra el viento*

XIA Xi-yao<sup>1</sup>, FU Shu-hua<sup>2</sup>

(1.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njing Tech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6, China;

2.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Abstract:** The novel *Contra el Viento* by ángeles Caso vividly portrays the resilient survival of African immigrant wom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uropean middle class. These immigrants face cultural violence and symbolic violence in terms of gender, class, and race, enduring numerous instances of physical, mental, and sexual abuse. While exploring how marginalized immigrant communities can break free from the cycle of violence, the author also reflects on the deeply rooted phenomenon of European centrism and the challenges faced in multicultural practices.

**Key words:** gender-based violence; structural violence; cultural violence; *Contra el Viento*; ángeles Caso

(责任编辑 赵莉萍)